

读史阅世

明清易代之际闽琼黄氏宗亲跨海续谱

□陈耿

1644年冬天,大明王朝灭亡之际,福建莆田黄氏给海南宗亲修书一封,希望琼州一脉将历代世系繁衍信息寄到莆田,以便续修族谱时载入,补全家族史料。

琼州方面给莆田回信是在清顺治十四年(1657年)三月,彼时已是时隔12年之后。两封家书跨越两朝,说的都是黄氏家事,只字未谈国事,尽管当时正处在改朝换代之际,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似乎没有对这个家族带来太大影响,至少在家族信息交流方面是如此。

福建来信

闽琼两地黄家的故事得从600年前讲起。民国五年(1916年)续修的海南《黄氏家谱》对此有较为具体的记载。

1412年,明永乐十年,福建莆田人、进士黄重携妻带子,渡海南下上任琼州“抚黎知府”,奈何夫人柯氏惧怕海浪,在雷州半岛时决定返回故里,不与丈夫、孩子一起过海。黄重卸任后,喜欢上民风淳朴的琼山,便在“抚岛村”(今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黄村)落籍,子孙后代又继续迁往岛上其他县份迁徙。

黄重入琼后的200余年间,莆田和琼州两地的黄氏宗亲一直没有联络。然而,在明代的最后一个冬天,从莆田寄往海南的一封信家书又让两地的同宗弟兄重新“走动”起来。

“前书一缄寄达兄台在今年四月间也,日候德音尚未得报,恐传于诸浮沉者乎?因有鸿便,故再陈于左右矣。自莆入琼之始祖讳重公来守是邦,遂家焉。独柯树人怕海啸,临舟乃命驾返,至今杯土,春秋拜奠,皆敬房诸人设推爱及之。向未音信隔绝,地远、人遐、意更,数代遗忘所自,理势然也。近闻在琼之伯叔兄弟,森森岳立,真无愧吾宗云,慰甚。幸际此时有余君号锦台者,任琼永丰仓,乃莆田人也,会语间知亲且友,则必不吝片笺询及柯树人遗体卜葬何所,论仁孝之心,实应尔!客岁大宗祠修族谱,刊刻世系,重公后只书河清、河济,清子智礼、智仁,后书及致祥,故不敢书也。今便闻在琼之世系,科名与夫补弟子贤者,乃类编成帙寄来入载,凑完全锦,岂不休哉?惜惜不尽欲言,望风渴注会悟,何年兹接接封书,庆幸当何如耶?谨布腹心仰祈崇昭。崇祯甲申岁冬至日莆田东里贡元房房长伟国彦、国瀚、世世、世科、世琦等顿首拜书。”

这封在族谱里题为《莆田寄琼州书》,不足400字的家书,执笔撰写者为“黄朝麟”。

信中写道,黄重的原配夫人柯氏回到莆田,百年之后,每年都由同宗兄弟扫墓祭拜;后来,莆田有位姓余的人到海南当粮官,告知莆田父老琼州黄氏人才济济。因此,字里行间,莆田那厢有责琼州宗亲之意——既然知情,理应写信询问柯夫人到底葬在哪里,这是基本的“仁孝之心”。

信里还提及,上年(1643年)修族谱刊刻世系时,黄重的后代只记录到两个儿子——黄河清和黄河济,以及黄河清的儿子黄智礼和黄智仁,再往后的不详,所以不敢书录。如果将琼州的世系和科名等资料汇集汇编,寄来莆田,将谱牒编凑完整,不是很好的事情吗?

据海南《黄氏家谱》,黄重的次子黄河清乏嗣,长子黄河清的次子黄智礼出继给他;黄重后来又续娶汪氏,生一子黄河源。想必黄重与柯氏一别再无音讯,琼州的事情,莆田方面不得而知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家书落款时间“崇祯甲申年”,即明崇祯十七年(1644年)。莆田黄氏当年四月就给琼州宗亲修书一封,族谱未收,估计正如莆田宗亲所言“恐终付诸浮沉”,没有寄到海南。有意思的是,第二封是在这年冬至即十一月写的,其时已进入清顺治元年,不知为何还沿用“崇祯甲申”的年号?(编者按:其时福建还属南明势力范围)

莆田寻根

顺治丁酉年(1657年)“季春望日”(三月十五日)前后,海南黄氏宗亲修书一封《琼州复莆田书》,篇幅较长,将近千字,言及多端人情关系,尤其是琼州黄家子弟的多次莆田寻根之旅。

书信的开头先是对莆田黄氏说一番客套话,然后说及虽然知道渡琼始祖根在莆田,但“世远人湮未得其详”,正是得到莆田父兄的“示谕谆谆”,才知道莆田黄氏琼州一支由“孟刚祖”(黄重)入琼任官开始。又说孟刚祖生前文集年久失传,只有七世黄显、八世宏宇和宏宪、九世世之的家刻,但比较零散,还需要时间搜罗汇集,再与琼州的世系、名号一并寄上。

据查,信中提到黄显是进士出身,生有六子,长子黄弘(宏)字也登进士,次子黄弘(宏)完及其长子黄善之都是举人。

“舍弟见辉以明经于正月赴京廷试,便道一访祖籍,未下果如愿否。欣闻族尊讳天须恩选入京,谅必便中相遇。”黄见辉是黄显的曾孙之一,为四子黄弘(宏)宸次子黄及之的儿子,

号“益菴”,明天启甲子年(1624年)岁贡。1657年的春天,他又参加清廷的殿试,顺道探访莆田祖居,但不知结果是否如愿。那一年,莆田同族有位叫“黄天须”的恩贡也将入京应试,他们可能会相遇。

从写信者的语气判断,他应该与黄见辉同辈,而且年岁稍长,都是渡琼始祖黄重的十世孙。《琼州复莆田书》还称,其早在1646年秋天,黄见辉赴吏部应试,到莆田上任时,就拜奠了柯夫人的坟墓,并与同宗伯叔兄弟见面,详细了解200余年来黄氏本、支的繁衍世系。他们还在莆田县城南门黄朝麟(正是此人执笔给琼州写信)家的亭子中“咏酒赋诗,赏月写怀”。

1648年,莆田有位名叫黄默雷的宗亲到广东当官时,曾到琼州拜谒祠堂,并与海南的弟兄欢聚一堂,甚至得以晤面从莆田归来的黄见辉。

书香名第

根据民国《黄氏家谱》可知,黄重卸任后,在琼山定居下来,续弦汪氏是明洪武二十九年(1396年)举人,国子监助教,学正汪从周(琼山人)的女儿。600年来,其后人已传至27代,后人约7000多人,散居在海口、文昌、定安、屯昌等地的103个村庄。

明清两代,海南先后诞生了6对父子进士,其中明代的黄显和黄弘宇父子便是其一。这个家族不乏名科,举人、贡生更是不胜枚举,明清两代,他们与海南先贤海瑞、郑廷鹄、张岳崧等人关系密切,或姻亲,或至交,相互吟咏题赋,留下了兼具文学和历史价值的篇章,被收入族谱、方志或文集之中。

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说:“嘉靖、万历年间,巍科甲第,相望不绝。而以名儒筮仕,歿而祭于社者,有如墩江公及燕石、越石二公,其他乡荐、明经,指不胜屈,乡人荣之。”“墩江”和“燕石”分别为父子进士黄显和黄弘宇的号,“越石”指黄显次子黄弘宪。

还可从海瑞的一篇传世文章来了解父子进士黄显和黄弘宇的故事。“余与墩江公共籍琼山,居址去不十里许,恭人林氏之贤闻之矣。”海瑞在《黄恭人林氏墓志铭》中写道,自己所在的府城金花村和黄显的“抚岛村”相距不过十里左右,对其夫人的贤惠之名早有耳闻。黄弘宇在母亲林氏去世后即将下葬之时,给了海瑞一份母亲的行状,请他撰写墓志铭,海瑞便据实写了林氏的事迹。

原来,黄显的父亲黄通与同里的“高士”林

翁是莫逆之交,某日带黄显出门跟林翁见面,林翁觉得黄显是个奇才,当即表示将女儿许配给他,但其妻冯氏并不愿意以富家之女下嫁贫士,日夜絮叨反对,然而林翁不改初衷,不图丰厚的彩礼,林氏也深知父亲的切切心愿和长远眼光。

过门后,林氏虽然生活困顿,“脱富而贫”,却同甘共苦,持守“从夫之义”,从来不因鸡毛蒜皮的事情分散丈夫黄显的向学之心。家里有位小姑,性情刁钻,难以相处,林氏与她朝夕共处下来,反得婆婆的欢心。

海瑞认为,正是因为“墩江得有恭人之后,不徒有亲师取友之资,抑且内无高堂奉养之缺”,所以25岁时(嘉靖元年,1522年)便中举人,19年后又登进士第。黄显登科后并未马上得到官职,生活还是像以前那样清贫,但林氏安于现实。4年后,黄显才被授“西曹主事”,由于没有外差,住在京城,因此衣食都成问题,林氏也毫无怨言。

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,黄显外放临汝(今河南汝州),俸禄二千石,生活由此大为改观,林氏却不为所动,还跟仆役一起种桑织布,有人看不过去,说她是“秀才小家”。黄显晚年放纵自我,任性而为,林氏又整饬家风,操持内外,谨小慎微,井然有序。海瑞不由感叹道:“以一妇人而天资近道有如此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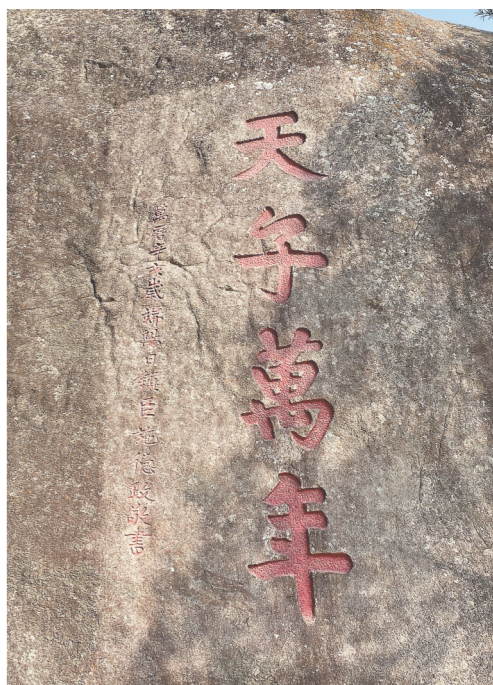
黄弘宇曾言:“家有严君,父母之谓。”他所理解的“严君”,不单是父亲,还有一位勤俭、谦恭的母亲。因此,海瑞断言:黄显和黄弘宇父子能够齐名乡里,让人称道,离不开林氏之功。

在这部民国《黄氏家谱》中,有多首黄弘宇的诗作,却未见其父黄显的诗文,倒是收录了同乡进士郑廷鹄的《送抚州墩江之任序》,是黄显到抚州(今属江西)上任知府前,郑廷鹄的一番勉励话语。因为抚州民风彪悍,不易管理,以往官吏大都严刑以待,但郑廷鹄希望黄显以德治之,怀化民风。

“余生也晚,不获见诸公。然先祖及先君子居琼时,与黄接比,余方总角,先君子述所闻墩江公乔梓科第事为训,余聆而慕之。”张岳崧说黄重裔孙、好友黄沙阳之请而撰写的《黄氏族谱叙》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显、黄弘宇父子声名远扬,持续到了清代中后期。

张岳崧在序文中还提到黄家为书香门第,不乏硕学之士,尤其是“沙阳以文雄,数冠琼军”,自己的文章也曾受黄沙阳的父亲黄淡宁点拨、指正。

(作者单位:海南日报社)



“天子万年”题刻

施德政期许“江山永固”

□郑训焘 郑松波 文/图

位于福清市海口镇的瑞岩山,以一座国家级文物、元代弥勒石雕造像而闻名遐迩。山上有岩洞千姿百态,更有宋元明清历代众多名人摩崖石刻100多处,具有很高的艺术和观赏价值。抗倭名将戚继光曾驻军于此,明代三朝宰辅叶向高少时也曾在此读书,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。

在瑞岩山顶存在一处独特景观,有三块巨石并排竖立,如同左右侍者簇拥着君王。中间最高的一块巨石高约3米,上刻“天子万年”四个大字,落款为“万历辛亥岁端阳日镇臣施德政敬书”。

“万历辛亥岁”即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年),题刻者施德政系江苏太仓镇海卫人,字正之,万历十七年(1589年)武进士,史书评其“平倭有功,剿逐红夷,闽人德之”,可见他不仅平倭,还抗击了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侵略者。施德政于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始任福建南路参将,由于征倭取得胜利后来提升为福建总兵。

万历三十年(1602年),倭寇进犯福建沿海,施德政派属下沈有容率舰过澎湖,全歼盘踞台湾的倭寇。施德政也亲自指挥了战斗。叶向高在《都督施公生祠记》中写道:“公(施德政)往守南路,澎湖甘山之役督率吏士驾舳舻,凌巨浸,以与倭鏖战于蛟宫窟窟之间,所斩获无算,迹年闽海之不波,固公先声所潜夺也。”

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七月,荷兰海军将领韦麻郎占据澎湖,派人送信给明朝官员,用重金与税使高案打通关节,“请以金钱数十万上供,而厚为税珣(高案)寿”,要求互通商贸。高案收到荷兰人的信件后,满口答应。福建总兵施德政得知后,再次命沈有容前往澎湖驱逐荷兰人。沈有容为了减少伤亡,率五十余艘战舰平阵以待,自己乘一舟带几名随从从澎湖与韦麻郎相见。见面后,沈有容义正词严地指出,台湾及澎湖列岛是大明的神圣领土,是不可侵犯的;若执迷不悟,一定会像三年前的倭寇在澎湖那样葬身海底。韦麻郎久闻沈有容大名,深知利害关系,对沈有容的严词斥责不敢违抗,于是叫来高案派遣的使者,索回贿赂高案的银两,扬帆逃离。

施德政是一名武将,也是一位清官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,宦官高案任福建市舶司兼管矿务。到了福建后,高案便强占土地,四处设立关卡,搜刮民财,祸害无数。“高案在闽,闽之缙绅不与往还者,不过二三人耳。”而施德政却是极少数“不与往还者”之一,并“始终与珣(高案)相抵牾”,反被诬告。

除此之外,高案还从事对走私、贩私盐。最令人气愤的是,高案还与占据澎湖的荷兰人相勾结,对他们抢夺人口为奴、占领中国领土等事情不闻不问。施德政派遣沈有容驱逐荷兰人后,断了他的财路,高案顿足长叹:“德政乃败吾事!”为此他四处为难施德政。就是在施德政升职为神机营右副将时,高案便强占土地,四处设立关卡,搜刮民财,祸害无数。高案在闽,闽之缙绅不与往还者,不过二三人耳。而施德政却是极少数“不与往还者”之一,并“始终与珣(高案)相抵牾”,反被诬告。

施德政在福建任职期间,驱逐外寇,保家卫国,受到福建军民的爱戴。在厦门、东山等地,也留下了一些他的题刻古迹。1602年4月,施德政曾经以南路参将身份,在东山岛大宴澎湖平倭将士,并赋《横海歌》一首,这首诗至今还刻在东山岛九仙山顶岩石上。

在厦门的醉仙岩,也镌刻着时任福建总兵官施德政、部将李杨、福建南路参将徐为斌等人在即将奔赴澎湖征程时所作的诗歌。其中施德政的七言律诗曰:偏师春尽渡澎湖,圣主初分海外符。鼙鼓数声雷乍发,艖舳百尺浪平铺。争传下妖氛恶,那管天边逐旅孤。为道凯歌宜早唱,江南五月有莼鲈。

施德政、陈一斋、沈士弘同登海南太武山时留下的诗文:立马闽山第一峰,海山无际豁心胸。身凌霄汉星堪耀,界限华夷手可封。踞踞喜寻仙子迹,登台羞问宋王踪。千年光景百爵酒,兴尽归来月满钟。

这些题刻诗句与刻在福清瑞岩山顶“天子万年”四个大字一样,正是施德政等爱国将领纵览山海风光时,抒发的尽忠报国、横扫夷寇、保国卫民的豪迈情怀和期许“江山永固”的祝愿。

乡土史记



- ① 举家欢乐
- ② 福善王庙
- ③ 春光长寿

泰宁福善王庙门楼装饰

□吴卫 据村睿 文/图

三明市泰宁县地处闽北山区,五代南唐中兴元年(958年)以“归化”为名立县,北宋元祐元年(1086年)宋哲宗御赐“泰宁”二字为新的县名,沿用至今。泰宁县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,境内文化遗产丰富多样,尤以明清时期建筑最能彰显其历史及地域文化特色,位于朱口镇龙湖村的福善王庙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。

关于福善王的来历,在明代编纂的《八闽通志》有记载:“神姓欧阳,名祐,洛阳人也。仕隋为泉州守……官蒲西,归至此,闻雩鼎既迁,耻事二姓,遂挈家溺死。时乡人高计、李定适渔于河,遂险其夫妇二尸,合葬于大乾山阳,后人又立祠墓祀之。匾曰‘欧阳太守庙’。”宋咸平年间,县令张仕逊祷雨有应,遂大其庙……政和六年(1116年),封广祐王,累封仁烈显圣文惠福善王。”文中的“大乾”即今天的邵武市水北镇大乾村。1000多年来,福善王崇拜作为一种地方民俗以大乾村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,除了邵武市以外,泰宁县、光泽县,甚至江西省的资溪县、黎川县等地也在这一民俗文化圈内。

泰宁福善王庙位于朱口镇龙湖村南侧,始建于明朝末年,后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修缮增建,现存主体建筑为乾隆年间建造。建筑坐东南朝西北,依山而建逐层升级,大体由山门、雨坪、门厅、正殿及其北侧跨院的观音堂组成。其中,福善王庙的门厅与大殿之间没有以常见的廊院作为过渡,而是直接连为一体,从而显得布局紧凑。整个建筑最精彩的部分都聚集在门厅入口的砖砌门楼上。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早年来闽

考察时曾如此评价福善王庙门楼:“考察了许多砖雕古建筑,唯有此庙砖雕最为精细。”

福善王庙门楼由青砖砌筑,平面呈八字形,三开间,重檐五滴水。门楼的砖雕装饰题材类型多样,大致可分为花卉、瑞兽、人物、锦绮四种,雕饰工艺手法有圆雕、镂空雕、浅浮雕、高浮雕、线刻等。虽然历经200余年风雨,部分雕饰已残损,所幸大部分仍保存较好,内容可辨。初看门楼的外立面几乎布满雕饰,给人以繁复之感,实际上仔细揣摩之后可以发现,其布局和内容设计是遵循了一定逻辑的,可以用三个词来归纳:礼制秩序、伦理教化、祈福纳祥。

所谓礼制秩序乃指福善王是受到朝廷敕封的神祇,因此其庙宇建筑的形制、装饰都会体现出其礼制等级特征。关于前者,从门楼的八字形平面以及前殿歇山式屋顶已经有所显示,至于后者则需要做进一步的解析来认识。

首先,明清时期对于建筑等级的规定十分森严。明代制度规定,“官民房屋,不许雕刻古帝后、圣贤人物及日月、龙凤、狻猊、麒麟、犀象之形”。清代大体承袭明制,对于装饰题材的使用往往有更细致严格的规定,寻常人家使用可能招来僭越之罪。福善王庙门楼的装饰大量采用珍禽瑞兽的形象,包括龙、凤、狮(狻猊)、鹤、麒麟、鳌鱼等,正反映出其享有较高规格的礼制等级。

其次,传统儒家思想主张“德莫大于和,而道莫正于中”,对于具有特定含义、或具有等级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。因此,福善王庙门楼上珍禽瑞兽的形象严格遵循中轴对称

的原则,分布在门楼的中轴线两侧,呈严格的镜像对称。例如门楣上的双狮戏绣球,绣球正位于中轴线上;垂柱柱头雕刻的麒麟,匾额两侧的龙、凤、仙鹤的头部也是对称朝向中轴线。

在诸多的珍禽瑞兽形象中,尤以龙的形象特别能彰显福善王庙的礼制等级。排除作为纯粹装饰功能、等级较低的“卷草龙”,门楼中轴线上的龙共有两组。第一组由三条龙组成,位于第一重檐下,围绕着“福善王庙”匾匾;一条正面龙伏在匾额,怒目圆睁,发髯皆张;匾额的左右各有一条穿云龙,龙头相对,昂首向上拱托匾额。第二组由五条龙组成,位于门楣上方横匾的位置。此外不设匾额,中心位置是一个正面龙首,上、下框各两条穿云龙,头均朝向中心的龙头。与第一组龙仅采用镂空雕技法不同,第二组的龙首部分还运用了高浮雕的技法,令五条龙极具动感,似乎随时会自墙中飞出。

至于伦理教化,主要是通过装饰来传达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准则。前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耕读传家精神的推崇。这种精神最典型的艺术表现形式就是“渔樵耕读”。在福善王庙门楼左右两侧八字墙檐下就有两幅砖雕,皆以自然山水为背景,左侧人物分别是樵夫、钓者;右侧人物分别是书生、农夫,赫然正是一幅“渔樵耕读”图。樵夫乃东汉名臣朱买臣,钓者是东汉名儒严子陵,书生为战国时期的苏秦,农夫则是上古时期的舜,可见这四个人物不仅是一时俊杰,事业成绩斐然,其品德、才学、风骨更是后世效仿的模范。